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日本「亞洲學」之系譜

The Genealogy of Japanese Asian Studies

doi:10.30390/ISC.201004/SP\_49.0004

問題與研究, 49, 2010

Issues & Studies, 49, 2010

作者/Author：邵軒磊(Hsuan-Lei Shao)

頁數/Page：79-9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004/SP\\_49.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004/SP_49.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日本「亞洲學」之系譜\*

邵 軒 磊

(台灣大學政治系博士後研究員)

## 摘 要

日本的世界觀核心——「亞洲學」(アジア研究，包括東洋學、東亞學等概念)作為日本近代發展的關鍵性思想，對於日本國族的建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亞洲學從戰前對「中國學」的衍生物，戰後因為軍事色彩，亞洲學在日本中國學界中長期無聲，而現在卻是日本用以與世界對話的重要基礎概念。本文藉由對日本思想界中亞洲學所承載的觀念的研究，整理作為思想系譜的亞洲學歷史，用以說明戰後亞洲學呈現的特色以及與戰前亞洲學的不同。亞洲學的系譜有三點核心意識：作為日本民族自身的投射；作為日本藉以對「內／外」對話的知識體系；將亞洲視為空間性存在。亞洲學不但是日本用以與西方對話的產物，其本身正是東西方文化對話的產物，藉由對此呈現的學術考察，也就能更明白東西方百年的互動軌跡。

關鍵詞：亞洲學、朝貢體系、殖民學、現代中國研究系譜、戰後日本

\* \* \*

## 壹、研究背景

「亞洲」是日本思想體系中世界論的基礎。尤其是在近代日本(19-20世紀前期)之中，為了脫離以中國為核心的華夷秩序的定位而必須提出一套新世界觀來取代既存世界觀，<sup>①</sup>具體表現出來的論述就是「亞洲」(日文為アジア或稱東洋、東亞)。綜觀而言，日本思想界提出亞洲觀念的作用，在建立外／內兩個層次的理解：外部表現在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中國學的知識人類學研究」(計畫編號：NSC-98-2811-H-002-015)之研究成果。

註① 可以從當時「漢學」轉變為「東洋史」的軌跡中看出，東洋史作為一個學科的政治意義是：「在接受西方文明過程中，東洋史這個學問範疇不但是要研究中國，更是要重新建構日本史，包括其與中國關係。」李朝津，「日本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慶應義塾大學政治學科之個案研究」，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50卷第1期(2007年3月)，頁30。

「亞洲做為歐洲對立面」<sup>②</sup>的認識，也就是正如竹內好所說：「東洋之所以可能，必須先有歐洲的既存。」<sup>③</sup>這個論述意味著，東洋是相對於西洋的存在。另一方面，內部目的在於：「怎樣從文明史的角度來闡釋由中華帝國到日本帝國之近代史上東亞盟主更換的必然性。」<sup>④</sup>這種論述也可從福澤將「擺脫中韓」<sup>⑤</sup>的主張，定名為脫「亞」論中可以看出，初期日本亞洲觀念的範圍與主要成員就是以中日韓為核心的東亞。<sup>⑥</sup>

因此亞洲論作為日本賴以生存的表述基點，其內容必須包含中國，但又不能以中國為主，<sup>⑦</sup>因此亞洲學與研究中國的學問<sup>⑧</sup>之間，自始就產生了微妙的共變關係。總的來說，「亞洲」的觀念的開始就是以「抵抗外部／建立自我」<sup>⑨</sup>為核心，隨著日本政府海外擴張政策，「建設亞洲」被移植為日本民族自信的投射與使命，<sup>⑩</sup>最後演變成日本必須領導東亞對抗西方。<sup>⑪</sup>戰爭結束後，由於「東亞共榮圈＝亞洲」所具有的戰爭色彩，<sup>⑫</sup>以及美蘇冷戰對立的結果，<sup>⑬</sup>亞洲學在戰後並沒有得到充分思考的機會，有日本

註② 日本近代史的重要轉折點中，從 1853 年「黑船襲來」以降到「華盛頓海軍會議」都表現出「東／西」二元對立而「衝擊→轉變」的史觀，奠定了「攘夷到開國」的轉變，作為東西對立基礎，日本一國的形象漸漸被統一而清晰起來。

註③ 都築勉，戰後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真男とその時代（橫濱：世織書坊，1995 年），頁 192。

註④ 子安宣邦，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8。

註⑤ 原文是「惡友を親しむ者は共に惡友を免かる可らず。我は心に於て亞細亞東方の惡友を謝絶するものなり。」中譯：「與惡友親近的人就不可避免的會跟他一樣，我們必須從心與東亞惡友斷交。」

註⑥ 子安認為：「脫亞論」基本上構成了日本近代亞洲文明的戰略。是建立在歐洲對於東方（Orient）的關係移植到日本對於亞洲的關係上的，最大的影響來自黑格爾對希臘、東洋的停滯性主張。子安宣邦，前引書，頁 82。

註⑦ 石之瑜將亞洲學建立的由來，從東京學派創始人白鳥庫吉力圖以科學方法掌握橫互東西方文明的歷史法則開始，也從岡倉天心以英文綜述包含儒學、佛學，也包含中國、印度與日本在內的東洋精神開始，到日本軍國主義信奉八紘一宇的王道思想，及其派生的世界史方法所包裝的大東亞共榮圈為止，歸結其目的為「處理如何退出中國的問題」。石之瑜，「退出中國——近代日本對華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與政治正確性問題」，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50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1~3。

註⑧ 初期是漢學，戰後又加入了現代中國研究、區域研究、國際關係等各種學科。

註⑨ 甚至以都築的比喻來說：「東洋的認識是與敗北的感覺做出聯繫的，而以此為限，抵抗也不斷存續。」都築勉，前引書，頁 192。

註⑩ 石之瑜認為，日本對東亞的領導主張是建立在日本對東亞的心理依賴之上的。換言之，這種心態一方面是日本既要領導亞洲來抗拒西洋，另一方面又要仰賴與中國作伴來充實亞洲的內容，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是亞洲作為概念提出來時所不能逃避的課題。（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6 年卷 4 期（2006 年 8 月），頁 2~3。）

註⑪ 雖然正如子安所說，「東亞」的觀念並不是單純的少數主張，而是所有日本思想家共同的歷史體驗。「（隨著戰爭的發展）……將東亞新秩序的觀念化、理論化的工作中，亞洲主義者、西田哲學系統的歷史哲學者、學院派的歷史學家、政治學家、以日本浪漫派為中心的文學家、馬克斯主義中國亞洲社會科學者，這些學者專家紛紛被動員或是自願加入解讀工作。」（子安宣邦，前引書，頁 53）

註⑫ 子安雖然為「亞洲學」辯護，認為日本近代過程中的各種亞洲主義話語帶來了政治性的「東亞」概念（進而導致戰爭）是不正確的！相反的是，日本發動了對中國乃至亞洲的戰爭，引發了既有的各種意識形態的匯聚而鑄成了新的「東亞／大東亞」概念。（子安宣邦，前引書，頁 51）但是實際在歷史表現上，日本戰後不斷迴避談論亞洲，日本的各種意識形態也不試圖解釋亞洲學，甚至欺仰與否定，而幾乎讓亞洲退位與消失在研究場合中。

註⑬ 冷戰結構下的國際政治因素使得美中（國民政府）想快速解決戰爭責任問題，因此並沒有致力於對日本原有價值的徹底清算。姬田光義，「中国革命と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東京），第 7 期（2000 年 9 月），頁 19。

學者指出當時的亞洲觀「缺乏完整反省」。<sup>⑭</sup>從現代的角度來看，戰後學界對於日本的未來發展形態，雖然分爲社會主義路徑和西式近代化路徑兩種觀點，但可以說作爲近代化日本國族認同核心的亞洲觀卻被壓抑，亞洲經濟政治模式被視爲落後甚至「停滯」。

由上所述，日本戰後對戰時思想脈絡的排拒和冷戰結構的壓抑，加上主流意識形態爲歐美近代史觀或社會主義，「亞洲」在日本思想界一直是空缺而沈默的概念。而這個現狀隨著日本的自信而產生變化，日本學界在 70 年代後半開始逐漸重新能以「自我主體性」的立場發言，也開始意識到必須要有立場表述自己的存在，表現在之後發展就是回到「亞洲」，表現在 90 年代崛起的「亞洲研究風潮」，<sup>⑮</sup>在日本學界中曾經一度消失的一個學科、觀點，在 90 年代表現出如此強勁的力量甚至將成爲未來 21 世紀的「重要趨勢」，<sup>⑯</sup>這種轉變的過程值得注意。

因應此一趨勢，中文世界中對於「亞洲」思想開始關注。包括孫歌竹內好的悖論中以竹內好對「東／西」兩種文明的抗拒，來說明日本獨特思想掙扎而表現出「作爲方法的亞洲」的脈絡。<sup>⑰</sup>而錢婉約藉由對漢學／中國學的考據指出日本與西洋漢學的不同在於對「亞洲身份」的占有性。<sup>⑱</sup>石之瑜由回溯整套日本使用亞洲面對歐美的歷程中，反而讓自己陷入西方的殖民主義框架，而無法面對「中國崛起」的困境。<sup>⑲</sup>最後從

註⑭ (冷戰體制)造成了「面對亞洲問題的國家層次思考判斷能力已經喪失。而冷戰結構容忍日本這種判斷能力的狀態。……所以『東亞』就是戰後日本沒有再積極去重構建設關係的亞洲區域。」(子安宣邦,前引書,頁57)

註⑮ 90年代,「亞洲」成了日本話語上的重要主題。依照子安宣邦的整理,重要著作包括岩波書店編集部編,新しい世界秩序と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 卷1-7(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4年)。山田辰雄、渡邊利夫,講座現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東京:緑蔭書房,1996年)。齋藤次郎、石井米雄編,アジアをめぐる知の冒険(東京:読売新聞社,1996年)。功刀達朗,歴史の共有アジアと日本(東京:明石書店,1997年)。青木保,佐伯啓思編,「アジア的価値」とは何か(東京:ティビーエス・ブリタニカ,1998年)。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年)。青木保,アジア・ジレンマ(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7年)。石井米雄編,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東京:国際文化交流推進協会,2000年)。大沼保昭,東亜の構想:21世紀東アジアの規範秩序を求めて(東京:筑摩書房,2000年)。萩原宜之、後藤乾一,東南アジア史のなかの近代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5年)。以及日本政治學會編,日本外交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小林英夫編,帝国という幻想—大東亜共榮圏の思想と現実(東京:青木書店,1998年)。轉引自子安宣邦,前引書,頁61-62。

註⑯ 原洋之介,「アジア学の方法とその可能性」,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編:アジア学の将来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頁4。

註⑰ 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註⑱ 「日本自身是亞洲國家,它對中國的認識同時也包括對亞洲自身的認識。日本和中國一起構成自我,這樣的雙重身分使對中國的認識十分有趣。」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5。

註⑲ 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6年卷第4期(2006年8月),頁17。

對於近代日本思想的日文著作大量翻譯成中文的趨勢<sup>20</sup>也可以看出：在中文世界已經關心的是作為「思想」的亞洲觀，以描述性的方式將「日本人／學者的亞洲觀念」作為討論基礎，但是鮮少討論到對「亞洲研究」正面而加以直視，討論亞洲作為「研究／學科如何被產生？」則尚未有此類著作。

本文延續此一脈絡，對作為學科史的「亞洲學」的全貌歷史加以描繪。將以亞洲學自誕生至現在，以時間為軸，描述出其間研究系譜關係，考究「亞洲學」在近現代日本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其思想與政治系譜又從何而來？本文指出，亞洲學與近現代日本的民族認同息息相關，然則不是單純與西方或中國產生共變關係，而是同時具有「內／外」兩種層次，於是「亞洲／西方／中國」呈現三組概念交錯的態勢，本文將由戰前、戰後、80 年代之後三個分期，同時描述亞洲學的內外層次，用以說明觀念系譜演變與受容的態勢，並試圖建立日本亞洲學的要素模型。這樣的研究有助於了解「亞洲」在日本思想史的核心角色，並能理解現今日本在面對中國威脅論時的焦慮來源，<sup>21</sup>同時在未來亞洲學術社群的對話上，提供一個對日本亞洲學系譜的理解脈絡。

## 貳、戰前亞洲學之分析

一般認為日本建立「近代化國家」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亞洲觀念的提出。重要的思想家包括福澤諭吉、<sup>22</sup>岡倉天心、<sup>23</sup>內村鑑一、北一輝、尾崎秀實、橘樸、<sup>24</sup>中江兆民、<sup>25</sup>內藤湖南、<sup>26</sup>內田良平<sup>27</sup>與竹內好<sup>28</sup>等人，在對日本的國家發展提出前景的過程中，都提出了對「亞洲」的看法，但這些思想家所關注的都是放在日本如何在亞洲領域興起，僅只討論了「日本在亞洲的角色」、「亞洲在世界的角色」，把亞洲視為一個

註<sup>20</sup> 包括子安宣邦，前引書。以及野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航蹤（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6月）等等。

註<sup>21</sup> 在日本思想界既有的亞洲論述以及有關中國東亞性質的語境中，極少有由中國單獨面對西方的理論主張，可是中國崛起的論點恰恰暗示了中國不必先結合日本，就可以單獨面對歐美。這是為什麼日本思想界一旦面臨中國崛起這樣的課題，其所能提供給政策界的視野十分不足的原因。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卷第4期（2006年8月），頁1。

註<sup>22</sup> 關於福澤的部分，請參考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頁1~13。

註<sup>23</sup> 關於岡倉天心的部分，請參考錢婉約，前引書。

註<sup>24</sup> 內村鑑一、北一輝、尾崎秀實、橘樸請參考野村浩一，前引書。

註<sup>25</sup> 小松裕，「中江兆民とそのアジア認識」，歷史評論（東京），第379期（1981年11月），頁74~94。

註<sup>26</sup> 內藤湖南研究会編著，內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東京：河合文化，2001年）。

註<sup>27</sup> 初瀬竜平，「內田良平研究の視角——右翼・ファシズム・アジア主義」，北九州大学法政論集（北九州），第5卷第2期（1977年12月），頁213~248。

註<sup>28</sup> 平石直昭，「竹內好における歴史像の転回——大東亜・魯迅・アジア」，思想（東京），第990期（2006年10月），頁72~93。

舞台，而非研究對象，無法稱為現代嚴格定義下的亞洲研究。<sup>②</sup>也就是說，本文較偏重亞洲學學術（科學）典範的脈絡之上的討論，將「亞洲學」視為一個「學科」（discipline）。<sup>③</sup>

本文認為直到 19 世紀中「東洋學」的確立，<sup>④</sup>提出「亞洲做為區域範圍，而且中國／亞洲必須分開對待」，同時藉由種種「區域調查」方法，實際前往亞洲做出田野研究。在此之後，作為東洋學核心觀念的「亞洲」（亞洲學／アジア研究），才在 19 世紀末期伴隨日本的近代化／資本主義化而生，在日清／日露戰爭（亞洲內／外）之後更為發達。若吾人將此時「亞洲」視為內外對話策略來看，可以發現：亞洲是對內部作為日本建立自己成為民族國家的工具，對外部則是日本藉此進入世界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與西方諸國對話的過程。

## 一、亞洲學的誕生—以滿洲鐵道部為核心而展開

初期對日本亞洲學研究者而言，「研究範圍」雖然與漢學<sup>⑤</sup>大致重合，但自認研究方向不同於漢學。<sup>⑥</sup>具體而言，相對於漢學對文史哲的研究，亞洲學必須處理內在亞洲與外來歐洲的對應關係。當時的核心問題是：日本必須「從屬／自立於歐美？」、「與亞洲侵略／共存？」做出回答。<sup>⑦</sup>對外方面，就當時日本的發展觀點上，相對於歐洲對亞洲學的研究而言，原初日本處於一種落後的心情，加上在文化器物上近代化的需

註② 為了集中討論作為「學科史」的亞洲，本文僅關注於作為「亞洲研究／アジア研究」本身的一系列系譜。上述思想家的「亞洲觀」，極其複雜，而且如福澤與中江之間的亞洲看法完全相左。本文受限於篇幅而無法詳細討論，僅只討論亞洲學的「學科」系譜，關於上述亞洲政治思想家與「區域研究」者之間的關係，當另闢專文加以討論。

註③ 如錢氏研究「從漢學到中國學」的此一系譜，就把東洋學在東大開設講座視為「中國學」現代學科建立的代表。錢婉約，前引書，頁 21。而另一方面，組織式學科研究者也自認為與其他思想者典範完全不同，甚至對其他研究者有「浪人」這種較為輕蔑的說法。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1984 年），頁 11。

註④ 錢認為：一、日本人意識到要把中國歷史作為一門外國史來對待也就是「它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本國史的宗主；二、在世界的範圍內，以中國歷史為主的東洋史，是與西洋歷史相對應、分庭抗禮的世界史的一部分；三、標誌著文化教育界和學術研究者的關注物件，從古典的傳統中國轉向於現實東洋世界（錢婉約，前引書，頁 9）。

註⑤ 近代以前，由於江戶幕府的鎖國政策，日中兩國並不存在正式的國家關係，作為日本本地學問的「漢學」，是注重中國的古典研究。伊藤一彥，「日本の中国研究」，安藤正士等編，現代中国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90 年），頁 4。相對亞洲學而言，在漢學的領域中，研究對象並不是空間而是文化，「中國在哪裡？有什麼？」並不是研究的重心，重心是圍繞著中國典籍的「觀念」考據。

註⑥ 就研究者交流而言，當時彼此來往不多。根據山根的分類：中國研究在戰前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支那通」、「漢學者」或是所謂的「支那學者」的人，其研究重視傳統中國。還有一個分類是重視近現代中國研究，對政治、經濟、社會等等，從事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的中國研究者。山根幸夫，「現代：戰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が国中国現代史研究の背景」，山根幸夫編，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 年），頁 493。

註⑦ 原覺天，前引書，頁 4。

要，亞細亞研究可說是在一種：「面對當時的普遍化的需要上，對亞洲特殊性的摸索。同時以此了解遲發的亞洲是一種命定結果還是可能改變。」<sup>③</sup>當時的亞洲／中國的觀念在研究範圍上很大程度競合，<sup>④</sup>因此亞洲研究就是用以處理中國研究的方法論範疇，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具有價值與道德意義的「觀點」。

亞洲學的研究對象沿著「朝鮮→滿蒙→中國→東南亞」路徑而開展，<sup>⑤</sup>無疑的是伴隨著日本的亞洲擴張路徑，滿鐵創立者白鳥庫吉<sup>⑥</sup>也不諱言「日露戰爭後南滿州的經營必須由我國民著手，而朝鮮的保護與開發任務也落到我們頭上之時，在學術上對此處從事基礎研究乃是當務之急。」<sup>⑦</sup>也就是說，亞洲學一開始就與政策結合，帶有國家主義色彩。<sup>⑧</sup>而 1908 年的滿洲鐵道部（以下簡稱滿鐵）的設立，就是對朝鮮滿州研究的重大指標，也被日本學者認為是日本當地「現代意義上中國研究」的開端。<sup>⑨</sup>

當時以滿鐵為代表的國家政策研究機構，目標在於建設「文裝的武備」與「學俗近接」，<sup>⑩</sup>後藤新平在 1907 年所規劃的初期機制構想中，設置了三個部門分別擔任不同的功能。首先「調查部門」分為舊慣調查班、經濟調查班、露西亞調查班三個，以現地調查為主。其次是滿州歷史地理調查班，第三是東亞經濟調查局，兩者皆設立於東京，以文獻研究為主。<sup>⑪</sup>自此日本亞細亞研究可說是轉變為「殖民研究」，殖民地概念是政治的從屬關係，也就是國家主權、領土權的延長，所以政策的基調也就是做為國家意志的活動對象。所以注重三個側面：1. 殖民地或是目標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實態研

註③ 原覺天，前引書，頁 4。

註④ 以東洋史為例：日本的東洋史，作為江戶時代的漢學（由清代的考證學）繼承而來，初期是以支那歷史為中心研究，1887 年東大史學科設置以來，開始使用以近代的東洋史研究方法；進入 20 世紀後由法國來的東洋學開始起作用，社會學、民俗學、言語學等研究法，隨著明治以來日本的政治勢力大陸伸張行為，對東洋諸民族產生興趣，開始發展。石田幹之助、山本達郎，「東洋史」，人文科學委員會編，日本の人文科学——回顧と展望（東京：文部省印刷局，1949 年），頁 85~86。

註⑤ 從時間來看，朝鮮史奠基於明治初年，之後在滿蒙史建立後才有東洋史的名稱（東洋史最早是 1894 年，東大支那史學科 1904 年，東洋史學科 1910 年），中國史則是大正到昭和年間誕生，太平洋戰爭後才有東南亞研究。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伝統」，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 年），頁 207。

註⑥ 學者白鳥庫吉（東京帝大教授）在日俄戰爭時遊學了歐美各國，受到各國的「亞細亞研究」的刺激，回國後也主張要經營日本的亞細亞研究。（伊藤一彥，前引文，頁 5）

註⑦ 旗田巍，前引文，頁 208。

註⑧ 但是必須要補充說明的是：旗田雖然並不認為當時的學術是為了政治侵略服務，但因為「學究性格」（與學術疏離）而使得有權者任意的利用學術，也就是東洋史學是「缺乏人間存在感」的學術。（旗田巍，前引文，頁 212~213）

註⑨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所認為的「中國研究」，當時只稱是「滿蒙研究」；這時候不將中國看成一個整體，而看成區塊的地理空間概念，反應的是「兵要地誌」作為參考點，得以「進出」的某處。安藤所認為是：「不是作為研究，而是作為進出目的的調查對象而已，就像軍隊對於作戰需要所做的兵要地誌那種形式。」安藤彥太郎，中國語與現代日本（東京：岩波新書，1988 年），頁 54。

註⑩ 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的初代總裁後藤新平主張「為了滿州經營的目的，要有文裝的武備」，主張「學俗近接」，自此與東大白鳥庫吉合作，於 1907 年設置了滿鐵調查部。（伊藤一彥，前引文，頁 5）

註⑪ 原覺天，前引書，頁 343。

究；2.這些地方的民族統治與經濟建設等政策的關係研究；3.對殖民政策學問的體系化研究。<sup>④</sup>在發展初期即有東佃精一、矢內原忠雄、山本美越等人對於殖民政策的理論和實際的驗證，對殖民學的種種理論性發展貢獻，以現代後殖民理論的眼光來看，仍不失為前瞻性的作品。

## 二、戰前亞洲學的特色

作為殖民政策學的亞洲學，在戰前戰時的發展，表現出四項特色：

### (一) 知識論：「方法論」觀念的首次提出

東亞經濟調查局在設立初期即導入了「科學性」的概念。<sup>⑤</sup>主要在 1935 年前後產生變化，分為兩期。之前屬於文獻為主，之後則是由土地調查與舊慣調查為核心，甚至藉由訓練訪員開始，試圖建立調查的一貫性與科學性，以滿州經濟年報（1938 創刊）為代表，當時執筆者甚至試圖將說明理論構成之由來與意見。<sup>⑥</sup>這種「試圖說明理論構成」的心情與動機，是前所罕見的，可以認為是日本當地作為「研究方法論」的先聲。當初所強調的「科學性」與現在的觀念不同，而是相對於「政治管轄」說出事情的「真相」，強調研究的自主性，所以文末都要列上「個人意見，與滿鐵本部無涉」等字樣。<sup>⑦</sup>也就表示了，日本學界最初意識到「方法論」是奠基於對權力者「說明自己研究正當性」以及對外國（西方）「說明自己殖民的正當性」的這個需要而來的。

### (二) 科學研究方法：組織化與累積性

其次是首次呈現的動員組織式研究<sup>⑧</sup>相對於以往的漢學研究法——「支那浪人」（對於支那通的輕蔑說法）對於支那事情的「報導」，<sup>⑨</sup>組織系統的研究方法必須依照某種可傳授的準則，而不是靈機一動的「心得」。同時由於調查部的主導者後藤新平對於「文獻主義」不信任，因此主張「用腳來學」，也就是實態調查非常執著。<sup>⑩</sup>為了訓練訪員，<sup>⑪</sup>必須建立一整套訓練機制與研究準則，這種訓練之後也促成了日本「人類學

註④ 原覺天，前引書，頁 6。

註⑤ 原覺天，前引書，頁 345。

註⑥ 原覺天，前引書，頁 8。

註⑦ 原覺天，前引書，頁 9。

註⑧ 原覺天，前引書，頁 345。

註⑨ 甚至這種對沒有研究方法的「漢學」的輕蔑，在戰後也不斷加劇。1949 年 10 月中共建政之前，日本期刊世界 1949 年 8 月號特集中「怎麼看中國的現狀—支那學者的回答」中：松本善海（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指出，到中國革命為止的中國研究者中的「支那通」、「支那問題研究者」要與「漢學通」、「支那學者」分開，前者對於討論時事問題，後者專職研究過去中國。（山根幸夫，前引文，頁 494）

註⑩ 原覺天，前引書，頁 351。

註⑪ 在動員能力方面以原提供的數字：「滿鐵創立之初即有 200 名研究員，1943 年達 400 名，若加上研究委託、委員會、囑託調查等等協力者則高達 1000 名。」原覺天，前引書，頁 103。也就是說，訪員約有 400-500 名，要將這些訪員訓練成統一的「規格」必定需要有一套教材。



研究／田野調查」在中國研究界中的獨特資料與研究傳統。

### (三) 對內的意義：亞洲空間化

東亞研究所的調查研究被稱為「兩本柱」，包括：總合調查研究和地域調查研究。前者又細分為四項（「赤色」帝國主義對東亞侵略的狀況，歐美諸國與猶太財團對東亞政策的細目，中亞／南洋／支那回教徒的動向與現狀，喇嘛教對蒙古與西域的影響），而地域的調查以地理為主，分為環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五項。<sup>52</sup>體制上則是為了遂行研究目的，而分為五部：第一部（企畫、業務、自然科學、統計、翻譯五班）；第二部（蘇聯、外蒙青海二班）；第三部（支那經濟 1-3 組、支那政治、支那社會文化、滿蒙六班）；第四部（南洋 1-2、大洋洲、列國四班）；第五部（印緬、西亞、回教、英國四班）。<sup>53</sup>也就是說，「亞洲」變成依照區域而分類的觀念，而不是依照文化或歷史，安藤更指出這是「兵要地誌模式」。<sup>54</sup>這造成了隨著滿州事變之後，日滿支經濟組合乃至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都實際上無視於亞洲人民的存在。<sup>55</sup>由人員編制與預算分配可以看出地理研究不只是研究的核心觀念，更是研究建立的目標，也就是把亞洲／中國研究地理概念化而且空間化，並不與其對話。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像，就是「空間／資源」為核心的客體化模式。

### (四) 對外的意義：試圖與西方對話

從滿鐵的主要智庫機構「東亞經濟調查局」，主要偏向國際視野的研究，因此為了易於接受各國來的情報以及準備提供政府資訊，而設立於東京三菱赤煉瓦街<sup>56</sup>的事實。<sup>57</sup>以及創始初期派遣岡松參太郎赴歐洲學習並引進新的視點與研究方法，並招聘外國人以利學習國際立場與國際對話，此舉甚至緩和了日本的擴張行動在國際上的風評。<sup>58</sup>這兩件事，都象徵此時亞洲學主要對話的對象，是西方而非亞洲本身。

在日本向亞洲擴張的同時，亞洲研究原有的多樣性卻走向一元化。在戰爭初期，雖說殖民調查形式佔了大多數，但是考察個別的學者，對於中國現狀關心的人也在所多有。<sup>59</sup>日本學者前往中國、滿洲、東南亞、印度等地調查，甚至也有同情當地民族從事民族獨立運動的事例。但在 1941 年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後，日本進入戰時體制，軍方與政府由上而下的「大東亞共榮圈」成為理論的指導性原則，之後所有的研究必須符合這個前提與結論。<sup>60</sup>表現在 1942 年，帝國政府成立「大東亞省」取代對滿事務局、

註<sup>52</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 101。

註<sup>53</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 101。

註<sup>54</sup> 安藤彥太郎，前引文，頁 54。

註<sup>55</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 4。

註<sup>56</sup> 位於政治中心丸之內區，明治時期開始就是東京最西化的地區之一，又稱「倫敦一丁目」。

註<sup>57</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 343。

註<sup>58</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 345。

註<sup>59</sup> 伊藤一彥，前引文，頁 4。

註<sup>60</sup> 原覺天，前引書，頁 79。

興亞院、外務省東亞局、南洋局與拓務省的任務。而民間方面，所有的亞細亞團體的活動必須納入 1941 年 7 月成立的「大日本興亞同盟」與「大政翼贊會」的範圍。<sup>⑥①</sup>作為最主要亞洲學組成的「殖民學界」也被統合到 1942 年創立的大東亞省創設之「大日本拓植學會」，<sup>⑥②</sup>隨著這個現象發生的是個人研究者的發表空間與研究資源萎縮，在思想上完全限制的結果，可說結束了實證主義意義<sup>⑥③</sup>的研究。

綜上所述，進入 1941 年的戰時體制後，亞洲「研究」在日本可說是實質上消滅了，但亞洲學隨著戰爭的進行而龐大發展，慣行調查<sup>⑥④</sup>成為發展重心。日本民族自此完全將自身的發展投射到「亞洲」之上，「日本帝國」的範圍與命運甚至等同於亞洲（東亞），「西方／中國」作為敵性思想在帝國統治範圍內完全禁止而消失。結果是：戰前亞洲／中國研究的理解結束了對古代與古典的研究，漢學不被重視；<sup>⑥⑤</sup>其次，同時僅將亞洲內部當作地理空間，也不關心同時代的中國的全體，呈現「無人」的亞洲的現象；第三，對話的對象本來還有西方，但隨戰爭的發展也只剩與自己內部對話的亞洲學。作為學科，戰前的亞洲學本來對內是因應漢學（日本原初意義的中國學）的缺少部分而生，對外為了與歐洲對話找到自身位置，但自此亞洲學作為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已經過於龐大，總體而言，亞洲學在戰時已經停止對話功能，「亞洲」的範圍與實質全然與「日本帝國」等同。所謂的「支那事情」，不能說是學問分科的一部份，而必須理解成「中國作為媒介，讓日本人與近代對決」的這種視角。<sup>⑥⑥</sup>

## 參、戰後缺席的「亞洲學」

戰後以野原四郎在「東洋史的新立場」的主張為例：「東洋史研究必須要與過去支持中國研究的日本帝國主義一起崩壞。」<sup>⑥⑦</sup>在這樣的思考中正是印證了戰時「亞洲學＝

註⑥① 原覺天，前引書，頁 79。

註⑥② 學會下分理論、歷史、政策三部門，會長為高岡熊雄。（原覺天，前引書，頁 83）第一次大會主要報告了對南方地區研究的成果以及日本殖民政策未來的構想。包括：加田哲二「南方民族政策的基調」；大藏公望「大東亞建設と我國策」；金田近二「殖民政策と共榮圈」；蠟山政道「世界史より觀たる大東亞共榮圈」四篇論文。金田試圖建立完整的「殖民政策學」模式作為未來發展的藍圖，包括貫徹主體自覺、科學認識研究對象、確立基礎理論與研究政策技術四方面。（原覺天，前引書，頁 89）

註⑥③ 甚至可以說，在戰後所建立的意識形態中心的研究史觀，是從戰時對實證主義的消滅而來的系譜。

註⑥④ 這些調查成果於 1952 年出版，書名為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東京：岩波書店，1952 年）是 1929 年東亞研究所學術部委員會所立案，由滿鐵調查部與北支經濟調查所組成「慣行調查班」所調查的，以河北四個村、山東兩個村作為調查對象。主要是以事件聽取（訪談）的方式，針對家族、村落、土地、所有、小作、水利等農村生活規範，使用社會學的方法加以精細記錄。山根幸夫，「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東京），第 62 卷第 5 期（1953 年 5 月），頁 440。

註⑥⑤ 安藤彥太郎，前引文，頁 54。

註⑥⑥ 安藤彥太郎，前引文，頁 54。

註⑥⑦ 村松祐次，「戰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一橋論叢》（東京），第 23 卷第 1 期（1950 年 7 月），頁 47。

日本帝國」的形象，也就推論出日本戰敗等同於亞洲戰敗，演變成爲亞洲價值反倒也隨日本戰敗而低落。也就是說由於對戰前亞洲路徑的錯誤，反而造成對於戰後亞洲的壓抑與缺席，一轉成爲社會主義和西歐發展路徑爲主流，也就是對於日本而言，只剩下兩種思想路徑，<sup>⑧</sup>分別是：「亞細亞生產模式（馬克思）」與「亞細亞停滯論（黑格爾）」。<sup>⑨</sup>以 21 世紀的觀點回顧：「20 世紀是蘇聯社會主義與美國資本主義，兩方作爲『前進』烏托邦思想，並且作爲巨大的意識形態將人拘禁的時代。表面上是對立的，但是實質上都是以人類的能力、理性爲基礎，能夠將現實世界成就成某種理想社會的現代進步主義。」<sup>⑩</sup>而且兩者都把亞洲的位置放低，輕視亞洲。這樣的「進步／落後」的觀點，簡單成就了「歐美／亞洲」的二元關係，也就是說亞洲學隨著日本的自信一同遭受否定，亞洲學自此在內外的層次上都失去原先被創造出來與西方對抗的立場。

日本此時主要關心西方價值，近代化路徑在戰後初期盛行，起因於在 1948 年歷史學研究大會，以討論「世界史的基本法則」爲核心，並且想證明「英法爲主的西歐發展路徑，是否能在亞洲表現出來？」這個問題，從而規定出一套「原始共同體到共產主義的交替路程」作爲一國史的發展階段。<sup>⑪</sup>因此當時日本史學的任務就是找到諸國的發展位置是在哪一個階段，意味亞洲必須抹消「亞洲性」，才能在西歐發展路徑上而有進步的可能。

對於日本的亞洲內部／中國觀點而言，1949 中共建政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後，日本左派大受鼓舞，50 年代中葉開始以馬克思主義作爲藍圖，積極以「時代區分論」強調世界史中的「共通性」，並以此中國／日本歷史做出分期。<sup>⑫</sup>在理論上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不但超越了日本，更「意味著亞洲在馬克思的路徑上超越了大部分歐洲」。<sup>⑬</sup>在遠山這段話中，表現出來的是他認爲中國的革命等同於亞洲的進步，<sup>⑭</sup>加上後來毛派「越落後越能革命」的主張，使得日本學界對於自己能有超越歐洲的可能找到了出口，也就是之後革命史觀佔據在日本二十餘年的主要思潮<sup>⑮</sup>原因，呈現「中國＞歐洲＞

註<sup>⑧</sup> 野沢豊，「回顧と展望」，現代中国研究（東京），第 3 期（1998 年 9 月），頁 103。

註<sup>⑨</sup> 原洋之介，「アジア学の方法とその可能性」，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編，アジア学の将来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 年），頁 25。

註<sup>⑩</sup> 遠山茂樹，「世界史把握の観点」，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 年），頁 3。

註<sup>⑪</sup> 早期的著作包括從翦伯贊、邵循正、胡華等編，中国歴史概要（中国歴史概要）（東京：一橋書房，1956）開始、到西嶋定生，「歴史的省察の方法について」，理想，第 283 期（1956 年 10 月），頁 11~31；鈴木俊、西嶋定生共編，中国史の時代区分（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7 年）。近代方面的分期討論則有安藤彦太郎，「近代中国の時期区分」，早稻田政治経済学雑誌（東京），第 140 期（1955 年 5 月），頁 25~40。胡繩，「中國近代歴史的分期問題」，歴史研究（東京），第 1 卷第 1 期（1954 年 1 月），頁 5~15。金沖及，「對於中國近代歴史分期問題的意見」，歴史研究（東京），第 2 卷第 2 期（1955 年 2 月），頁 37~51。

註<sup>⑫</sup> 遠山茂樹，前引文，頁 4。

註<sup>⑬</sup> 在實質上，這樣的亞洲是去除「亞洲性」而被放在馬克思的西方路徑上的亞洲。

註<sup>⑭</sup> 國分良成，「建国 50 年——中国研究与中国近現代史の再検討」，北大法学論集（札幌），第 51 卷第 4 号（2000 年 11 月），頁 1396~1397。

日本≧亞洲」的史觀，也就是中國的「先進性」完全超過亞洲以及日本。

不過隨著日本經濟社會重新復甦，亞洲的觀念也漸漸浮現，對於歐洲模式產生了抗拒。55 年萬隆會議後，進一步把亞非拉的概念串連，用來成為「民族獨特性」的思考基礎，也開始對於「新世界史觀」加以主張。對世界的看法<sup>⑤</sup>與世界史中的現代亞洲<sup>⑥</sup>等作品也隨之推出。之後於 1962 年福特基金會事件發生時，隨著反美浪潮的興起，日本學界意識到日本自身對於亞洲的責任，甚至有將這段時間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形容為「戰後脫亞」<sup>⑦</sup>的說法，意味著 1960 年代思想進程中，亞洲與日本主體在道德上必須結為一體；而且亞洲價值重新被提出。由此飯塚浩二、上原專祿等人也相繼提出對於歐洲白人近世以來對其他種族文化的壓迫與迫害。<sup>⑧</sup>這種對歐洲的批判也是在對亞洲位置的自信上建立的，但是建立的基礎日本並非正面面對歐洲，而是將自己併入「亞洲價值」之中，也可由上原淳道總結了戰後前期（1970 年為止）日本對於亞洲學的總體觀感：「日本人在提到亞洲研究時的『亞洲』，並不是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將日本作為亞洲的一部份，不認為亞洲學作為日本人的研究，而是作為亞洲人的研究。」<sup>⑨</sup>這種論述表示：試圖將日本隱藏在亞洲中表達的企圖。<sup>⑩</sup>

戰後亞洲學的思考轉折與文革轉變同期，來自於 1971 年對於「世界史要如何把握？」這個問題提出了比較文化論，主張要研究「中日朝間有關比較史的認識」。<sup>⑪</sup>這顯示主要的突破有兩點：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亞細亞」觀念的再度解析，不再滿足於西方慣用理論的套用。其次對於「近代化論」中「日本比中朝優越」的假設要再一次辨明。日本雖說作為亞洲人而研究，但也開始正視亞洲的差異性。從這個觀點出發，有三木且的「地域研究と歴史學」中對於「一次性認識」的強調，主張以「接觸」的構造分析代替文獻資料的解讀分析，提倡使用傳記方法，而認為這樣能解決日本當前「學術與現實疏離」的問題。

總體而言，戰後日本亞洲學從完全被壓抑，轉而依附「中國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史觀」以及「西方／近代化」發展觀點。伴隨日本經過 60 年代的快速成長，漸漸願意

註⑤ 上原專祿，*世界の見方——現代をどう考えるか*（東京：理論社，1957年）。

註⑥ 上原專祿，*世界史における現代のアジア*（東京：未來社，1956年）。以上兩書之評論可參照，遠山茂樹，前引文，頁5。

註⑦ 蠟山芳郎，「殖民地獨立の時代と日本」，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年），頁119。

註⑧ 遠山茂樹，前引文，頁4

註⑨ 久保田文次，「東洋史近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東京），第79卷第5期（1970年5月），頁907。

註⑩ 1963年，竹內好將亞洲主義編為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的第9卷，並加上了一篇緒論式的亞洲主義的展望（後改名為日本的亞洲主義另行出版）以及題解。在此前後，有關亞洲主義的重要人物如岡倉天心、頭山滿、內田良平、宮崎滔天、北一輝、大川周明等的傳記、研究著作也不斷問世，在述及明治以後日本所走過的歷史軌跡時，幾乎必定會觸及亞洲主義。（孫歌，前引書，頁151）

註⑪ 尾藤正英，「歷史理論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東京），第81卷第5期（1972年5月），頁508~512。

表達自身的亞洲個性，<sup>②</sup>加上隨著文革後革命史觀的下降，「アジア」的思維才離開這樣的陰影，發展出自身的立場。因此馬克思主義退潮之後，亞洲學與日本主體性不約而同的一起復興，同時作為戰爭研究而被忌諱的田野調查，也開展了一波的甦醒。

## 肆、80 年代亞洲學的復興 ——從「再評價」到「全面性理論」

隨著「革命史觀」的消失，日本中國研究界在 70 年代後半開始發起再評價風潮，並且陷入缺乏「全面性理解」理論的困境，1980 年代的亞洲學帶有的是「模糊中國」<sup>③</sup>的特色。當時的變化是：由於「1.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路徑的動搖，而且對於世界認識觀的再檢討；2.對於區域主義的現實，以更多區域間『利益』與『矛盾』的思維來思考；3.世界規模的事件與區域紛爭問題導致了國家意識的興起。」<sup>④</sup>也就是說中國的特殊性與「神聖性」已經下降，日本試圖與中國尋求在客觀平等的基礎上對話，這個基礎就是亞洲。

因此 1980 中葉後的中國研究，在屬性上脫離意識形態，反而更多變成亞細亞研究的一部份；伴隨著日本對於自我認識的新歷程，反倒成為以亞洲學為主要思維的模式。日本用什麼方法正視亞洲？問題意識也有相當的轉變，依照濱下的歸納主要有四方面的新思維被提出：1.研究經濟流動的同時，要注意人並不充分流動的事實；2.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並不能解決發展中國家、少數民族、社會多元性的問題；3.歐洲式的發展也不能完全解決前述問題；同時能不能將歐洲作為一種「自我認識／世界認識」加以思考；4.而對「歷史普遍性」的再檢討不只是對歐洲世界東方主義，同樣的也是對非歐洲世界「西方主義」的檢討。<sup>⑤</sup>濱下雖然沒有提到「亞洲」，但作為這四個問題共同的解答，就是直接面對「亞洲」，具體而言，就是找出亞洲發展的自身規律。

1986 年濱下的「朝貢體系論」則是近期對整體亞洲史理解與研究方法的全面性理論之一，本文以此為代表加以說明「亞洲／中國」觀念的變遷。主要的著作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sup>⑥</sup>以及朝貢貿易體系與亞洲，<sup>⑦</sup>在研究中結合地緣政治與儒家文化研究

註<sup>②</sup> 溝口雄三也認為這些新的歷史認識，也必須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日本人論放在一起思考。由於 1960 年代的經濟快速成長，對於之前的日本論「都是以歐洲發展文脈為前提，與此相較日本的發展很遲，因此要找出歐洲之所以發達的原因。」相對的，之後則是更強調日本的特質與個性。濱下武志，「アジア研究の現在」，溝口雄三等編，交錯する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 年），頁 5。

註<sup>③</sup> 「模糊中國」意味著中國並不是單一完整的狀態，由於幅員廣大，對邊陲來說與中央的關係也許還不如與周邊地理上相鄰的其他國家關係更密切，所謂「國界」終究只能是模糊的。因此日本對於中國的「區域體系」，關心甚深，1990 年代之後研究產出更為龐大。

註<sup>④</sup> 濱下武志，前引文，頁 1。

註<sup>⑤</sup> 濱下武志，前引文，頁 2。

註<sup>⑥</sup>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年）。

等學科，以「朝貢」為核心描繪出整體的亞洲觀。在濱下的理解中「朝貢作為連結亞洲各區域的方法，以東亞為中心，包括東海、南海、東南亞、麻六甲甚至是印度洋至南亞的區域，以中國皇帝的威德為形式，實行的自由貿易體系。」<sup>87</sup>（參考圖 1）

而在實踐上，體系的特色是：第一、其中的主要行為者——「商人」，其民族與宗教的分野皆不如「朝貢意義」的分野。第二、貿易系統是以交易港與都市為中心，產生了交易圈與其結點。而各個結點又以在朝貢位置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交易形態<sup>88</sup>。所有結點並不無遠弗屆，而是與鄰近的海域、陸地發生連結，而遞移下去。（參考圖 2）由濱下對於亞細亞海域圖的範圍可以看出，他的思維必然受到戰前亞洲學在形象上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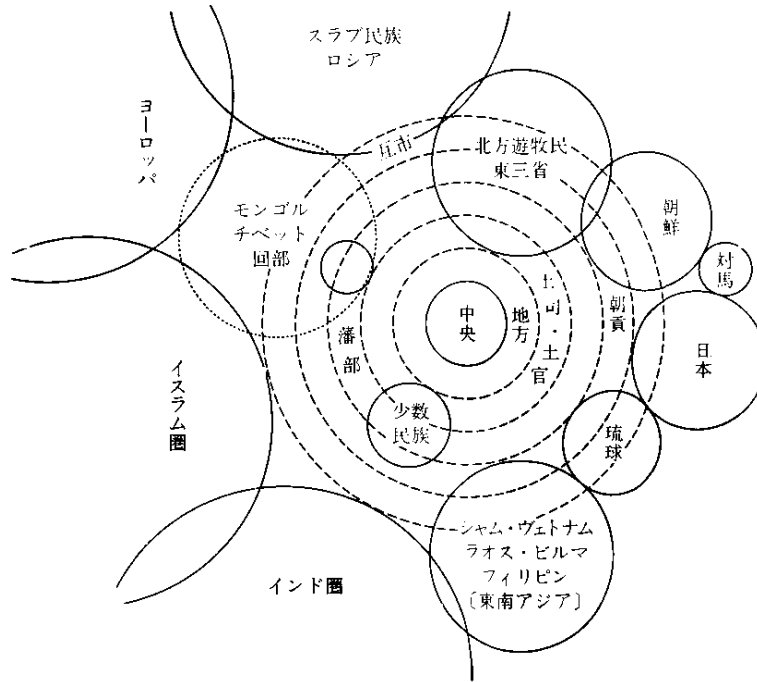


圖 1 濱下武志朝貢體系概念圖

資料來源：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頁 33。原名：清代中國與周邊關係圖。

註<sup>87</sup> 濱下武志，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

註<sup>88</sup> 濱下武志，「アジア研究の現在」，頁 2。

註<sup>89</sup> 包括：朝貢品與回賜品的買賣、北京朝貢使節團與特許商人的交易、入港通關地的交易三種。濱下武志，「アジア研究の現在」，頁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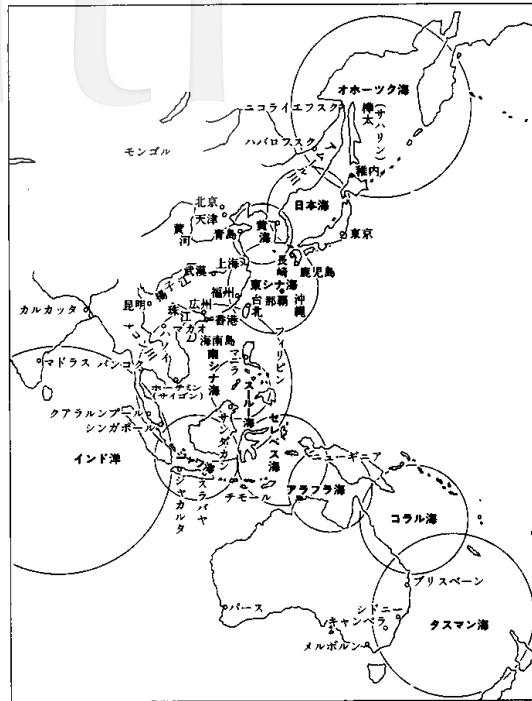


圖 2 濱下亞洲海域概念圖

資料來源：濱下武志，「地域研究とアジア」，溝口雄三、濱下武志等編，アジヤから考える 2-地域システ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 年 11 月），頁 8。原圖名：アジアの海域図。

若僅對濱下對亞洲學的繼受這一部分系譜而言：亞洲對於濱下是作為「空間」與「區域」而存在的，影響力甚至穿透了中國（以及大部分亞洲國家）既有的邊界。濱下也自承這樣的發想，是由於隨著亞洲意識的增強。<sup>90</sup>自此亞洲學走向正視亞洲，將亞洲視為「有機整體」以經濟史的視角，並關注作為亞洲各國近代史的前提「前近代亞洲市場」，以「亞洲規模」相對於西歐世界的相互浸透過程為媒介，對亞洲各國近代與前近代、西歐與亞洲的關係加以具體化研究。<sup>91</sup>也就是說從亞洲自身的歷史脈絡出發，對於近代化過程中的亞洲與西方關係，脫離了單純的刺激反應史觀。<sup>92</sup>

濱下藉由把中國的邊界模糊化，使用「區域的認識」，繼受了戰前亞洲學中將亞洲空間化的認識方法。依照此一立場，日本近代化的亞洲立場，被此一理論理解為政治

註<sup>90</sup> 濱下武志，「全球化中的東亞地緣文化」，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61。

註<sup>91</sup> 針谷美和子，「中國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東京），第 93 卷第 5 期（1984 年 5 月），頁 802。

註<sup>92</sup> 濱下武志在「海與國家」一文中更體現了將南沙群島問題以歷史方式對於從「多元文化領域／區域間交流」轉而成爲「一國的主權／排他的／紛爭的」場域的過程，以此對於中國的華夷秩序與西洋的主權國家的關係加以研究，同時也提倡注意對於「海域」所擁有歷史意味的重要性。帆刈浩之，「中國近代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東京），第 105 卷第 5 期（1996 年 5 月），頁 844。

上與中韓琉球的關係再編、經濟上將中國朝貢貿易轉換為獨佔商業貿易的過程。<sup>③</sup>在社會主義（革命史觀）的壓抑下，日本處於社會主義「後進國」，而傳統上對於中國「地大物博」的觀念也使日本思想界感到自慚。但以亞洲多元價值為主的朝貢體系世界觀中，藉由對中國「區域化／模糊化」建構理解，日本能夠取得與中國（個別部分）對話的地位，從而得到了在之前「革命史觀」體系中難以取得的自信，也是濱下理論作為當前亞洲學關鍵指標的理由。<sup>④</sup>

## 伍、結論：亞洲／中國／西方的對話系譜

日本亞洲學的系譜有三點核心意識：作為日本民族自身的投射；日本藉以對「內／外」對話的知識體系；亞洲作為空間性存在。

自始亞洲學被當成日本世界觀而生成，同時從殖民學作為亞洲學的誕生時間點看來，也與日本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同步，被賦予凝聚民族認同的重要任務，從而「亞洲」的內面（潛藏話語）就是「作為民族國家的日本」。從亞洲最早的知識社群「滿鐵」使用了日本最早的「方法論」以及創造了「組織」研究是為了與西方對話，以及將亞洲「空間」化的知識框架可以看出，亞洲成為日本不直接述說自己時的重要觀念，亞洲學的初始就是承載日本走向世界的知識工具。對日本而言「亞洲」代表的意義幾乎等同於「自身存在」，「亞洲／中國／西方」三組關係，呈現出三角的消長關係。甚至可以將「亞洲觀感」中所有的假設與前提等同於日本學者（甚至社會／民族）對自身觀感與關心的投射，當日本強盛的時候，就會傾向以亞洲的角色發言，亞洲學的研究成果也增強；反之就呈現低調，以西方或中國作為價值參考點。

更深入分析，亞洲學中由於「中國／西方」的內外角色不同，所呈現的態勢也有不同。就亞洲學內層而言，自誕生開始就與傳統漢學互相對立，之後發展成為殖民政策學時，發展為「亞洲停滯論」，並與「蔑視中國」結合，日本帝國在代換自身作為亞洲的同時，也將中國「空間化」，成為「無人」的亞洲學。而戰後亞洲學一轉成為缺位的狀態，尤其是中國革命之後，「革命史觀」掩蓋亞洲性格，社會主義價值成為亞非拉共同的發展目標，亞洲學只能成為補充「中國／社會主義研究」的一環；然而文革退潮對中國的熱情失去之後，對革命新中國的巨大「斷裂性」與陰影消失，意識形態研究也跟著消失，中國反而一轉成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研究成為亞洲學的一部份，更多研究者從考慮作為疆界中國的「不連續面」，轉而考慮中國內部的不連續面（滿鐵／田野調查系譜）與中國外部的連續面（亞洲學／朝貢體系系譜）。表現在濱下的朝貢體系

註③ 武內房司，「中国近代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東京），第96卷第5期（1987年5月），頁793。

註④ 在石之瑜的研究中指出，日本與中國在「亞洲」場域中的關係微妙：「日本對東亞的領導主張是建立在日本對東亞的心理依賴之上的。換言之，這種心態一方面是日本既要領導亞洲來抗拒西洋，另一方面又要仰賴與中國作伴來充實亞洲的內容，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是亞洲作為概念提出來時所不能逃避的課題。」（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頁2-3。）



論中，更是穿透了中國邊界，以整體亞洲的連動性做出說明。由整體系譜而言，亞洲內部的對話不多，而毋寧說整個 20 世紀，背後一直潛藏的是「日本＝亞洲」的思想系譜，而因此亞洲與中國在概念上互相擠壓。亞洲學可以理解為與中國學產生對立的產物，當中國色彩越重的時候，亞洲的顏色就越輕，反之亦然。這也解釋了日本在「中國威脅論」中，對中國的焦慮來自「回到亞洲」<sup>⑤</sup>的心情。

另外一面，對於歐美而言，亞洲整體性一直是影子般的存在，戰前日本亞洲學積極找尋與西方對話的舞台與空間，使用國際語言，甚至使用「方法論」的概念。而戰後卻回到亞洲停滯論或亞洲落後論的範疇，以旗田巍批判此為「缺乏體系而注重個別事實。以近代西方價值為基礎而蔑視東洋。不會想要變革或解放亞洲。」<sup>⑥</sup>為例，亞洲退縮到成為西方的對照，只有在當日本有自信批判近代化的時候，就能夠以亞洲的身分發言，反之亦然。日本藉「亞洲」與西方對話時，兩者不會互相擠壓，反而是更加強化立場。而演變到「朝貢體系」理論的出現，亞洲學內外兩方的區隔得到超越：內部亞洲不再是一個整體，而與亞洲外部也不再截然分離，亞洲從「概念」的亞洲轉為「實踐」的亞洲。作為心理上的意義，朝貢體系做為代表性的日本亞洲理論，讓日本能夠重新思考對亞洲的責任與定位，更使得日本找到「走向」亞洲的論述基礎。

而在研究對象與方法上，新的亞洲研究有以下幾個特徵：1.對「社會」的關心更深，以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為核心研究方法的社會調查帶來了與當今文獻理解很大的差異，使亞洲變成了田野調查的對象。2.文化的研究方法也帶來了不同的理解角度，比如說以「儒教問題」的「漢字、家族企業、儒教國家觀」為核心來理解的東亞「經濟發展至上」行為。這樣的議論過程中，將會充分意識到對於民族主義、歷史的中華意識。3.研究的表現方法上也以人口動態與生態分析等等的方法，以及現在流行的全球「セリオリ」(creole)<sup>⑦</sup>傾向。<sup>⑧</sup>當前日本的亞洲學發展有兩種趨勢，其一在戰後所忌諱從事的亞洲社會調查，現在隨著日本對亞洲的重構思維，漸漸走出；其二為全球化浪潮影響下，亞洲（尤其是東亞）經濟未來的發展。<sup>⑨</sup>更多學科整合與多元元素被融入亞洲學中，日本有一系列「亞非研究所」，使用的即是「跨學科式整合方法」(trans-

註<sup>⑤</sup> 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頁 1。

註<sup>⑥</sup> 周藤吉之，「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東京），第 72 卷第 5 期（1963 年 5 月），頁 667。

註<sup>⑦</sup> Creole 的原意是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的中南美屬地，或者路易斯安那（現為美國一洲），一些「本土化」的白種後裔，有時候、有些地方指當地的統治階層，也可能包括了混血的 metiso。這個字也可以指語言，如果是指語言，則代表經過和當地土語「混雜」後的「普通話」。（張茂桂，「書評：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台灣民主季刊*，第 2 卷第 3 期（2005 年 9 月），頁 155~164）關於詳細的概念，請參考李英明，*全球化與後殖民省思*（台北：生智出版社，2003 年）。

註<sup>⑧</sup> 濱下武志，「アジア研究の現在」，頁 3。

註<sup>⑨</sup> 如今東亞 21 世紀最大的變遷，就是巨大意識形態的對立在 20 世紀結束，而 21 世紀由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潮流（市場主義、自由主義）而開始。（原洋之介，「アジア学の方法とその可能性」，頁 4）在日本學者的思維中，東亞的全球化與亞洲經濟將成為這個世紀的主要課題。

disciplinary research) )，<sup>⑩</sup>這些對亞洲研究的視角轉變中，同時隱含日本對於自身認同的基礎。

最後是亞洲學的內部功能轉變：針對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的亞洲論述的發展，吉田辰雄在世紀之交闡述的五項主要亞非研究指針<sup>⑪</sup>以及滕維藻、奧村裕司所編輯的東アジア世界史探究邀請中日韓三國學者一起撰寫，努力將日本人的主觀觀點降低，尋求國家間的合作與討論。<sup>⑫</sup>之後也有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sup>⑬</sup>一書的推出。都代表了新的亞洲學方向將會朝向「亞洲內部對話」前進，也就是說對於以往「內外有別」的對話策略系譜不同，而尋求更多向內部文化間合作為目標。如今台灣、中國大陸、韓國甚至東南亞漸漸對於「亞洲學」加以關注，在更多的知識體系碰撞的時候，所呈現出來的身分和論述策略都將不同；不同學術社群與日本對話，將會使日本的「空間亞洲」轉換為「文化亞洲」，這些研究的產出將會是未來亞洲合作與發展的指針，也會使亞洲學的系譜繼續延伸。

\* \* \*

(收件：98年5月26日，接受：98年10月9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sup>⑩</sup> 菅野卓雄，「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創立四十周年を祝して」，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東京），第34期（1999年），頁2。

註<sup>⑪</sup> 武內房司，「中国近代回顧と展望」，頁792。

註<sup>⑫</sup> 本書是由中日韓學者共同編寫，呈現多元的歷史觀點。而且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中韓國民以至日本人民所受的傷害、三國戰後的處境與建設、21世紀東亞的和平課題，甚至包括敏感的戰爭賠償問題與歷史教科書問題等加以面對，這樣的嘗試不一定能讓所有的讀者都滿意，但是能表現出東亞國家立場的最大公約數。東亞三國的近代史共同編寫委員會，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香港：三聯書局，2005年）。

# The Genealogy of Japanese Asian Studies

*Hsuan-lei Shao*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Japan's core weltanschauung, "Asian Studies", as keywords in Japanese philosophy during recent development, has an instrumental effe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 of Japan. Asian Studies evolved from China Studies after the War. As the military did not have an influence on Japan's China Studies after the War, it is now an important basis for Japan'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produce a genealogy of Japan's Asian Studie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sian Studies after the war and how they differ from those before the war. There are three core grounds in the genealogy of Japan's Asian Studies: as a reflection of the nation of Japan; as the ontology of inside and outside dialogues; and as an existence. Asian Studies is not only a product of dialogues between Japan and the West; it is also a product of dialogu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e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through this research paper.

Keywords: Asia Studies; Tribute System; Colonial Studies; Genealogy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Postwar Japan

## 參考文獻

- 上原專祿，*世界の見方——現代をどう考えるか*（東京：理論社，1957年）。
- 上原專祿，*世界史における現代のアジア*（東京：未來社，1956年）。
- 久保田文次，「東洋史近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第79卷第5期（1970年5月），頁897~907。
- 大沼保昭，*東亜の構想：21世紀東アジアの規範秩序を求めて*（東京：筑摩書房，2000年）。
- 子安宣邦，*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 小松裕，「中江兆民とそのアジア認識」，*歴史評論*（東京），第379期（1981年11月），頁74~94。
- 山田辰雄，渡邊利夫，*講座現代アジア*（東京：東大出版会，1995年）。
- 山根幸夫，「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東京），第62卷第5期（1953年5月），頁440~443。
- 山根幸夫，「現代：戦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が国中国現代史研究の背景」，山根幸夫編，*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頁488~539。
- 内藤湖南研究会編著，*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東京：河合文化，2001年）。
- 日本政治學會編，*日本外交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
- 功刀達朗，*歴史の共有アジアと日本*（東京：明石書店，1997年）。
- 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東京：緑蔭書房，1996年）。
- 平石直昭，「竹内好における歴史像の転回——大東亜・魯迅・アジア」，*思想*（東京），第990期（2006年10月），頁72~93。
- 石之瑜，「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東京），2006年卷第4期（2006年8月），頁1~13。
- 石之瑜，「退出中國——近代日本對華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與政治正確性問題」，*中國大陸研究*（東京），第50卷第1期（2007年3月），頁1~8。
- 石井米雄編，*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東京：国際文化交流推進協会，2000年）。
- 石田幹之助、山本達郎，「東洋史」，人文科学委員会編，*日本の人文科学——回顧と展望*（東京：文部省印刷庁，1949年），頁85~91。
- 伊藤一彦，「日本の中国研究」，安藤正士等編，*現代中国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頁3~53。
- 吉田辰雄，「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創立四十周年を迎えての回顧と展望」，*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東京），第34期（1999年），頁4~9。
- 安藤彦太郎，「近代中国の時期区分」，*早稲田政治経済学雑誌*（東京），第140期（1955年5月），頁25~40。

- 安藤彦太郎，中国語與現代日本（東京：岩波新書，1988年）。
- 帆刈浩之，「中国近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東京），第105卷第5期（1996年5月），頁841~847。
- 西嶋定生，「歴史的省察の方法について」，理想（東京），第283期（1956年10月），頁11~31。
- 尾藤正英，「歴史理論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東京），第81卷第5期（1972年5月），頁508~512。
- 李英明，全球化與後殖民省思（台北：生智出版社，2003年）。
- 李朝津，「日本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慶應義塾大學政治學科之個案研究」，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50卷第1期（2007年3月），頁29~45。
- 村松祐次，「戦後日本の近代中国研究の動向」，一橋論叢（東京），第23卷第1期（1950年7月），頁45~65。
- 周藤吉之，「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東京），第72卷第5期（1963年5月），頁624~631。
- 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年）。
- 岩波書店編集部編，新しい世界秩序と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
- 東亞三國的近代史共同編寫委員會，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香港：三聯書局，2005年）。
- 武内房司，「中国近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東京），第96卷第5期（1987年5月），頁791~798。
- 初瀬竜平，「内田良平研究の視角——右翼・ファシズム・アジア主義」，北九州大学法政論集（北九州），第5卷第2期（1977年12月），頁213~248。
- 金沖及，「對於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歷史研究（東京），第2卷第2期（1955年2月），頁37~51。
- 青木保，アジア・ジレンマ（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7年）。
- 青木保、佐伯啓思編，「アジア的価値」とは何か（東京：ティビーエス・ブリタニカ，1998年）。
- 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
- 胡繩，「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歷史研究（東京），第1卷第1期（1954年1月），頁5~15。
- 張茂桂，「書評：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台灣民主季刊，第2卷第3期（2005年9月），頁155~164。
- 原洋之介，「アジア学の方法とその可能性」，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編，アジア学の将来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頁1~33。
- 原覚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1984年）。
- 姫田光義，「中国革命と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東京），第7期

(2000年9月),頁16~27。

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針谷美和子,「中国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學雜誌(東京),第93卷第5期(1984年5月),頁802~808。

都築勉,戰後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真男とその時代(橫濱:世織書坊,1995年)。

野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走向亞洲的航蹤(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6月)。

野沢豊,「回顧と展望」,現代中国研究(東京),第3期(1998年9月),頁101~118。

菅野卓雄,「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創立四十周年を祝して」,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34期(1999年),頁4~9。

國分良成,「建国50年——中国研究と中国近現代史の再検討」,北大法学論集(札幌),第51卷第4号(2000年11月),頁1396~1397。

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巻1——7(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4年)。

鈴木俊、西嶋定生共編,中国史の時代区分(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萩原宜之、後藤乾一,東南アジア史のなかの近代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5年)。

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傳統」,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年),頁205~228。

遠山茂樹,「世界史把握の観点」,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年),頁3~20。

蠟山芳郎,「殖民地独立の時代と日本」,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歴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6年),頁85~124。

斎藤次郎、石井米雄編,アジアをめぐる知の冒険(東京:読売新聞社,1996年)。

翦伯贊、邵循正、胡華等編,中国歴史概要(東京:一橋書房,1956年)。

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濱下武志,「アジア研究の現在」,溝口雄三等編,交錯する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頁1~12。

濱下武志,「地域研究とアジア」,溝口雄三、濱下武志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2—地域システ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11月),頁8。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

濱下武志,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

濱下武志,「全球化中的東亞地緣文化」,中国社會科学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討(北京:社會科学文獻出版部,2004年),頁32~67。